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学术自传



国际研究学部卷

周溯源 赵剑英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学术自传

陳奎元印

国际研究学部卷

周溯源 赵剑英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自传. 国际研究学部卷 / 周溯源, 赵剑英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203 - 0375 - 0

I. ①中… II. ①周…②赵… III.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自传
IV. ①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424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丽惠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2
字 数 359 千字
定 价 2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 委 会

顾 问 陈奎元

主 任 王伟光

副 主 任 王京清 张 江 李培林 蔡 昉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援	王卫东	王伟光	王京清	王 镭
方 军	曲永义	刘庆柱	刘 红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 江	张冠梓	张蕴岭
陈奎元	周溯源	赵剑英	崔建民	韩大川
程恩富	蔡 昉			

主 编 周溯源 赵剑英

序

王伟光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成立十周年，我们适时编纂出版这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自传》，这是一件嘉惠学人的好事，也是赠贺学部成立十周年的一份厚礼！学部委员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荣誉称号，获此殊荣者是各个学术领域中的佼佼者和领军者，学术素养深厚、学术成就卓越。这套学部委员学术自传的出版，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些优秀学者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使后学者能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同时，这套学术自传也是对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巡礼，展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薪火相承、人才辈出的盛况。在出版之际我谈一点感想和体会，代为序言。

我国的学部委员制度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作为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全国科学事业的领导机构。1953年，中央派钱三强、张稼夫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出访苏联，调研苏联在组织、领导科学事业等方面的经验，了解苏联科学院的学术管理体制等情况。1955年6月，中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委员制度，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四个学部，产生第一批学部委员

233 人。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产生学部委员 61 人。学部委员包括了我国社会科学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后，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于 1955 年、1957 年、1960 年、1963 年召开了四次学部委员大会，讨论、确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方针、任务和交流经验，规划重点研究项目，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等，在推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树立优良学风、努力培养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63 年以后，由于错误路线干扰，学部再未举行过学术活动，学部委员也再未增选，学部基本处于瘫痪和停滞状态。

1977 年中国科学院恢复学部活动并开始增选学部委员，1993 年学部委员改称院士，成为我国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恢复学部委员制度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强烈愿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自 1977 年成立后，在历届院长的领导下，与哲学社会科学界一起进行反复调研和论证，形成了大量的报告和方案，为恢复学部委员制度做了充分准备。2003 年我院制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年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着手设立学部委员制度”，以此作为加强人才建设，建成培养和造就一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重要基地的具体措施和步骤。2006 年 8 月 3 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分别设立了文史哲学部、经济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国际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五大学部，2010 年文史哲学部分为文哲学部与历史学部，形成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文哲学部、历史学部、经济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国际研究学部六大学部布局。2006 年，我院推选出首批学部委员 47 人、荣誉学部委员 95 人。2011 年，增选学部委员 10 人、荣誉学部委员 38 人。2014

年，增选学部委员4人。自学部成立后，我院共产生学部委员61人、荣誉学部委员133人。

我院遴选学部委员的标准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在遵守科学道德、维护科学精神、发扬优良学风等方面发挥表率作用。学部委员以自己的言行践行了这一标准和要求，他们将学术专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主持和参与了若干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理论创新、资政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社会服务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他们深厚的理论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勤勉的治学精神、优良的学术操守垂范于后学，是我院宝贵的学术财富。

中国社会科学网自2011年1月1日创办上线，为服务中央对我院“三个定位”的要求，增强我院在社科领域乃至国际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宣传好我院的科研成果与优秀人才，引领理论学术的思潮，该网在首页开辟了“学部委员”专栏，一是为学部委员开设专题介绍，二是设置“学部委员学术自传”栏目。这一专栏受到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好评，展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对外形象，扩大了学术影响。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了将学部委员宝贵的学术财富薪火相承，在学部成立十周年之际，我院在有关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在周溯源同志的积极推动下，在社科网专栏资料的基础上，再次组织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撰写学术自传。除了已经病逝或年高病重无法写作者外，有140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撰写了学术自传。这些自传朴实亲切、明白晓畅，讲述了各自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经历，叙述了自己如何做人，如何为人民求学、治学，如何克服困难，淡泊名利，甘坐冷板凳，忍受清贫寂

寞，“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追求精品力作，追求立德立功立言。这套自传不仅介绍了学部委员的学术成就，而且总结了他们各自的治学经验。从学部委员的学术自传中，可以看出他们在为人民做学问的路上，如何废寝忘食，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由于时间所限，这套学术自传有约稿型、访谈型、随笔型，虽然在整体设计和文体方面看似不甚统一，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学者的学术个性与风格。另外，由于各位学部委员学术自传的篇幅长短不一，考虑到篇幅的均衡问题，在付梓出版时没有按各学部划分独立成册，也是本套丛书的缺憾。此外，如能增加同行专家对学部委员学术成就与学术贡献的评价，则将起到锦上添花之效。

学术自传是作者对学术道路的回顾与总结，其中凝聚了作者的治学经验与治学方法，又有对新中国关于学术人才培养的描述，更不乏作者对学术与人格、学术与利益、学术与功名等关系的人生思考，因而这套学术自传既富有启发和感染力，又具有当代学术史的史料价值。当前，我院的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总体年龄偏大，有很多已到耄耋之年，他们的学术智慧和治学经验需要传承与发扬。因此，这套学部委员学术自传，可以称得上是一项学术史料的保护和抢救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今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希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为人民做学问，做大学问、做真学问。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习近平同志的殷切期望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努力追求的目标。我们也期盼这套学术自传的出版能乘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东风，推动我院、我国的科研人员以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的高尚追求和优良学风为榜样，不畏艰辛、不辱使命，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016年8月3日写于建国门社科院科研楼

目 录

(按姓氏笔画排序)

- 王金存： 艰难跨越的科研门槛 / 1
- 冯昭奎： 从工程师到社科研究者的人生之路 / 23
- 刘克明： 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开拓者 / 61
- 苏振兴： 平生未改拓荒痴 / 87
- 李 琮： 学术足痕回眸 / 121
- 李静杰： 学海作舟，自强不息 / 149
- 何 方： 从世界看中国 / 187
- 余永定： 一个学者的思想轨迹 / 207
- 谷源洋： 我对世界经济的研究与追求 / 225
- 张蕴岭： 我的“学术成道”之路 / 261
- 陆南泉： 潜心研究苏联体制六十载 / 279
- 陈宝森： 书山学海不迷路，探索真理要指南 / 295
- 周 弘： 随时代同行，与社会共进 / 315
- 徐世澄： 情系拉美研究 / 349
- 徐 葵： 我是怎样走上研究苏联之路的 / 373

目 录

陶文钊：孜孜不倦地探寻中美关系的奥秘 / 407

黄心川：我与东方哲学宗教研究 / 431

葛 佶：从零开始研究非洲 / 447

袁元伦：一生为国家利益而工作 / 483

后 记 / 499



王金存

Wang Jincun

男，1936年3月1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中共党员，1953年参加工作，任东北石油五厂会计员、人民监察员等职，1955年被保送到沈阳财经学院专修科学习，1956年考入该院本科（后该院并入辽宁大学），1960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同年以多学科优秀成绩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工作，1964年世界经济研究室改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在社科院工作四十余年，直至退休。起初研究苏联东欧经济问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研究国际形势和国际战略问题。曾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苏联东欧比较经济研究室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副主编，《世界经济调研》杂志编辑部主任、主编，研究生院世经政系副主任等职，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特邀高级研究员、首钢开发研究中心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高级研究员、河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2011年被遴

选为荣誉学部委员。有《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现代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趋势》等个人专著 6 部，发表论文和报告百余篇，俄、英文译著 5 部。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欧亚所科研成果一等奖、国家计划委员会科研成果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二等奖等。

艰难跨越的科研门槛

1960年我开始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后，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外语问题，由于我是调干生，外语基础几近于零，学校当时对外语也不重视，而我们这个苏东经济研究组几乎全是从苏联东欧国家归国的留学生，我为自己的外语盲坐立不安。在万分焦急中我曾打过退堂鼓，找领导要求调离世经室。与我谈话的是一位来自延安的名叫张世昌的老同志，他没有对我讲多少大道理，而是针对我说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请辞理由，教我做气功。他偌大的年纪半蹲半立做示范足有一刻钟，以致脸上沁出汗珠。最后他说，“你的外语基础差我们并非不知道，之所以把你留在世经室还有别的考虑。我看你正在读《资本论》，马克思不是说科学没有平坦的路，只有不畏劳苦的人才能到达顶峰吗，我相信你会闯过外语这一关”。他这种父兄般的教诲使我十分感动，从此我打消了改行调工作的念头，开始了咬紧牙关攻克难关的科研之路。从1961年到1964年的三年里，我基本上掌握了俄文的阅读和笔译。与此同时，我积极练习调研文章的写作。在此期间，我发表了5篇内部调研资料，并在《大公报》等报章上公开发表了两篇文章，这在当时我们这一批青年中算是成绩比较好的。回想起当年我们这帮青年，都是单身汉，住在所里的集体宿舍，除了吃饭睡觉，

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科研上，甚至在排队买饭的空暇也要念或背外文单词。当时党组织和所领导也提倡向科学进军，鼓励帮助我们尽快掌握业务。虽然条件差，生活艰苦，半饥半饱，但领导十分关怀我们的生活，几乎每晚都有领导到宿舍督促我们早点熄灯就寝。我之所以对踏入科研队伍这最初三年如此留恋，正是这三年宝贵的时间，培养了我衣带渐宽终不悔，勇于攀登科研高峰的意志，打下了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科研基础。

争分夺秒抢回失去的宝贵时光

自1964年春始，搞“四清”“文化大革命”，下干校，阔别了科研工作十余年，自息县干校回京后，我已从青年步入了中年。开始新的科研工作后，面临的困难和压力远比最初入门那三年大。压力最突出的表现仍然是外语：由于十多年与外语从未谋面，加之基础原本就不牢靠，我从干校回来后，甚至字典都不会用了。与此同时，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外语不仅要会读，还要会听会说。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原来学的俄语已不够用，还要学习英语。对科研成果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过去在世经室主要任务是为领导提供参考资料，现在要公开发表论文，要有自己的观点和创见。同时还要按时评定职称，每年要登记工作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放下工作脱产学外语已不可能。克服这些困难的唯一办法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延长工作时间，或者说是最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潜力。

值得庆幸的是，院所领导充分理解广大研究人员的心情和需要，取消了科研人员的坐班制，可以在家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这也体现了领导对广大科研人员的信任和寄望。在外人看

来，社科院的人在家里工作，自由自在，是一种特权和福利。但人们不知，我们大多数人在家里每天要坐三个班：早班、中班和晚班，而且这个特有的晚班常常要延续到夜里十二点甚至更晚。我的许多文章和著作都是夜深人静时在孤灯下伴随着家人的鼾声完成的，因为这时没有任何干扰，精神最集中，思路最清晰。对我来说，这种特殊的工作安排并非一时之举，而是持续了几十年。多年来，我几乎没有节假日的概念。

我走过了苏联经济研究的全程

值得欣慰的是，我这种笨拙、拼命三郎式的科研道路获得了颇为丰厚的报偿。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我出版了第一部专著《苏联经济结构的调整》。该书是“文化大革命”后苏东学界出版的第一部有关苏联经济问题的专著。尽管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科研新手的肤浅习作。但我在该书中提出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发展道路，“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经济滑向了崩溃边缘，今后我国的经济应该如何发展？我的这本书里贯穿着这样一种主导思想：苏联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则偏枯，苏联走的是一条压农业、卡消费、突击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它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战争迫在眉睫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20世纪30—40年代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证明了这条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这种道路在取得成功的时候就隐藏着突出的矛盾，战后这些矛盾则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为：农业的落后严重地拖了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后腿，加之轻工业落后，使人民生活难以提高，妨碍了

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发挥，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越来越不稳。这种发展模式是在斯大林与布哈林等人的生死搏斗中形成的，因此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并形成了理论加以固定化、模式化。斯大林的“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说，就是突出的例证。在这种思想理论的影响下，苏联的经济结构调整伴随着严重的政治斗争，因而步履艰难。

该书的上述种种思想不仅在我国苏东学界同行之中引起了热议，而且受到了许多政府工作部门的重视。例如，该书出版后不久就接到国家经委的来函，要我带着此书参加在昆明召开的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讨论会，发言介绍苏联的相关情况。过后不久，国家计委经济研究院又派专人来我所听取我对该书内容的概述，并邀请我参加该委申请的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科学技术进步”。该课题当年是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寿牵头申请的，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大学等单位的相关人员组成了一个颇为庞大的课题组，计委经济所一位副所长担任执行组长，他的主要任务是整个课题组的组织工作和各参加单位的分工协调工作，我的主要工作是提交有关国外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方面的相应报告，并负责组织起草课题的综合报告以及审阅各单位提交的分报告。该课题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专家组审议的评语是“国内首创，国际先进”，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软科学）”二等奖。由于我在课题中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课题组为我申请了个人科技进步二等奖，并颁发了证书和奖章。

苏联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告一段落后，我又着手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加之我